

學習外語和中文西化

喬志高

今春重訪港臺，在臺北時《中國時報》副刊編輯先生出示一篇美國來稿，寫目下中國人說話「普遍」夾用英語的現象。作者用反諷筆法加以嚴厲的批評，認為「中英夾雜」這種習慣係出於民族自卑感和盲目崇洋心理。他擔心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文化和千錘百煉、擲地有聲的文字，會被「夾雜文」糟蹋，終於「逃不出毀壞滅亡的命運」。

在香港，正趕上《明報月刊》五月號，裏面有一篇美國周質平教授論「新文化運動健將錢玄同與胡適」的文章。返美後看到六月號續登該文下篇，其中談到錢玄同曾力主「廢滅」漢文，而代以「世界語」（Esperanto）。據云，錢氏企盼有一天「世界人類各將其本國文字完全廢棄，共操 Esperanto」。作者的評語是：「這種樂觀的心理，而今看來，是近乎幼稚的。」

兩篇文章裏所提出對中國語文的觀點，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後者誠然太「樂觀」，以為換一套文字符號就可以掃盡中國舊文化的種種壞傳統。錢玄同雖支持胡適的白話文，但他不知道，以印歐語系語言為基礎而發明的人為「世界語」，不可能取代漢文（或任何民族自己慣用的語文）。前者又太悲觀，以為今天事實上的「世界語」（lingua franca）——英美語言——會威脅中國人的母語，甚至於危害中國固有的文化！

《中國時報》那位投稿人舉出許多中國人說話夾雜英語荒唐可笑的例子，表示這種情形不但廣植美國華人圈子裏，在經濟繁榮的臺灣普遍流行，即連大陸派出來的人物，也能說一口的「中英夾雜話」。

他沒有提到香港。這個一百幾十年來英國的殖民地，雖然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華人，直至晚近才把中文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不用說，香港人說話被英文「污染」的機會更多；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在工作與社交方面，還可能全部使用英語。「九七」以後，據說香港人可以保留他們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果真如此，他們豈非會變成摧毀中國文字、導致中國文化淪亡的一支潛勢力嗎？

我自己聽別人說話，不必要地攙雜英語，也有點反感。但仔細想想，這毋寧是「學習外語」的問題，而不是「中文西化」的問題。在快要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所謂「全球一村」的時代，面對資訊傳播、外交穿梭、經貿跨國、文化交流（包括思想、學

問、科技、美術、工藝、體育、娛樂、旅遊……) 等各方面, 不接受語言的衝擊, 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個民族勢必有學習一種或多種外語的需要。二次大戰之後, 英文美語成爲國際上彼此溝通的工具。這樣看來, 清末民初以降, 中國教育制度裏始終以英語爲「第一外國語」, 倒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當然也有例外, 如中共統治大陸初期的注重學習俄語。) 我們可以說它有時附帶養成少數人崇洋的心理, 但更可以稱它爲標誌世世代代, 時起時落, 追求「現代化」的努力。

語言是老百姓習慣通用的東西;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傳播媒介, 基本上不能由政府或專家, 從上到下, 勒令改革。過去多次漢字「拉丁化」運動行不通, 就是一個例證。語言也是環境的產物, 要受時間和空間的支配。目前中華民族在地理上四分五裂, 「人才外流」已變爲「人口外留」的可悲現象。單說來美居留的新華僑, 從目不識丁(「丁」字不帶鈎) 的大師傅到「托福」及第的留學生, 他們爲了適應環境, 謀生養家, 必須補習英文或再求深造。大學教授, 不管專攻尖端科技、社會科學, 或是文學、藝術, 碰到同行同胞彼此交談, 動用專門名詞和術語, 或引用某些特別美妙的西洋名句、成語, 一時還沒有妥貼的中文翻譯的, 也不免「中英夾雜」一番。

根據一九八零年的美國人口調查, 所有男女老幼、各種各樣的華裔居民, 總數不過八十萬, 即使過去八、九年內增加不少, 比起國內的十億人口, 等於滄海之一粟。不管他們的英文程度如何, 要說能形成一股風氣去影響祖國的語言,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何況過去四十多年來來美定居的第一代移民, 多半心在「魏闕」。他們在美國四處興辦中文學校, 就像往昔唐人街的老華僑一樣, 督促土生土長的子女學習中國語文。(成效如何, 又當別論。)

學習外語和夾雜英文, 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問題。日本民族擅於摹仿。二次大戰以後, 日本人把許多英文美語囫圇吞棗地放在自己的口頭語中, 被外人傳爲笑談。可是日本學會了美國的高科技術, 青出於藍, 大舉侵佔美國的汽車以及各種電器市場。有些美國人認爲要急起直追, 知己知彼, 只好去學日文。他們甚至主張用所謂「浸沉」(immersion) 的教學法, 從幼稚園開始。

法國人一向自負文化優越, 直到二十世紀之前, 法文是國際禮儀上不可或缺的通用語。二次大戰後由於速食、娛樂等美式文化的侵入, 法國人也無法防範法文裏面產生許多美語夾雜的怪詞。其實從中古時代以來, 英文本身早已大量吸收了法語, 美國人沿用至今而不自覺。近代英文美語中更明顯地採用許多法文字詞, 尤其在美食、時裝、汽車等方面; 時髦人士言談中, 間或穿插幾句法語以爲俏皮。

美國雖是種族熔爐, 但傳統地不注重學習外語, 在外交、貿易, 以及文化交流方面, 都感覺吃虧。近年來因要應付大批拉丁美洲移民, 引起國內「雙語教育」的爭議。有些人士提倡中小學開設西班牙語課程。本屆總統競選, 爲了爭取拉丁裔選民的支

持，兩大政黨都動員「西」語人才遊說。美國人心目中最難懂、難學的，當然是中文。今天許多美國大學設有中國語文課程，主修「中國研究」的畢業生能說、能讀。他們的中文造詣，遠勝於早年來華經商和傳教的「中國通」。

再講回中國人——無論在香港、臺灣、或大陸——依舊爭先恐後地學英文，這個新的「世界語」。他們究竟還是拿它當作外語來學、來用，最多為個人謀出路。真正想使用中文「全盤西化」的，恐怕絕無僅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之中倒會有學貫中西、慎思明辨之士，是中國現代化的促進者，也是對外宣揚祖國文化的生力軍。

一九八八年八月於美東瑪利蘭

譯界訊息

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香港翻譯學會頒授榮譽會士銜予兩位海峽兩岸的譯界翹楚：中國大陸的名作家楊絳女士（錢鍾書夫人、《幹校六記》作者），以及臺灣的翻譯家殷張蘭熙女士。

香港翻譯學會為了表彰對翻譯有重大貢獻的人士，每年均頒授榮譽會士銜，過去獲此殊榮者包括高克毅、宋淇、劉殿爵、賴恬昌、馬蒙、林太乙、何丙郁、蔡思果、林文月、楊憲益伉儷等。

該會並於同日在大會堂劇院舉行每年一度與市政局圖書館合辦的翻譯研討會，主題為「翻譯實踐」，內容包括：基本法的英譯問題、現行法例翻譯上的幾個問題等。

■ 楊絳女士接受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銜的答辭，特刊出如右，以饗讀者。

翻譯大概是個沒有止境的工作。譯者儘管千改萬改，總覺得沒有到家。世界文學傑作儘管歷代都有著名譯本，至今還不斷有人重新翻譯，表示前人的譯本還有遺憾。所以譯者常感歎「翻譯吃力不討好」，確是深知甘苦之談。達不出原作的好，譯者本人也自恨不好。如果譯者自以為好，得不到讀者稱好，費盡力氣為自己叫好，還是吃力不討好。

我缺乏自信，並且深知自己翻譯的種種缺點，不過，如能討得讀者的好，我就欣喜感激；如果能討得行家的好，那就更不用說了。香港翻譯學會給我榮譽會士的稱號，想是我討得了他們大行家的好，這是使我喜出望外的榮譽。我翻譯的作品大小不過三部，可是感喜之餘，顧不得自問是否合格，就欣然接受了。我不能親來領受這份榮譽，改用書面方式，也免得我「亮相」時廁身於大譯者之林而自慚形穢。我謹向大家道歉並道謝。

楊絳 一九八八年八月